

祖國的四川



廖平与近代经学

李耀仙

825.1
469L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廖平与近代经学

廖平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祖国的四川丛书

廖平与近代经学

李 耀 仙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刘运勇

(祖国的四川丛书)

廖平与近代经学

李耀仙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4.125 字数 57 千

1987年3月第一版

1987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册

书号：11118·218

定价：0.70元

编者的话

《祖国的四川》丛书，是一套介绍四川历史文化的普及性知识读物。本丛书的选题，主要是从各个侧面介绍四川悠久的历史、壮丽的山川、灿烂的文化、宏伟的建设、丰富的物产、杰出的人物、重大的历史事件、英勇的革命斗争……等等。如果读者能通过这些介绍，对四川地区的古今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，从故乡的发展变化中受到鼓舞，焕发出强烈的爱国之情、报国之志，积极投入四化建设，为建设家乡、振兴中华而奋斗，那就是我们的最大愿望。

本丛书在编写上，力求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，史实准确，文字生动，篇幅短小，图文并茂，雅俗共赏。今后，按读者的需要，我们将在出版单行本的基础上，再出版专题合订本。

绪 论

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本书的内容和旨趣，首先交代一个问题，即什么叫做“经学”？

我们撇开繁琐的考据，可以简切地说：“经学”的“经”，就是指儒家的经典，注释儒家经典的一门学问，就叫做“经学”。

或问：儒家只是先秦诸子学派之一，儒家学派有“经”，其他学派有没有“经”？如果它们也同样有“经”，为什么只有注释儒家经典的学问，才叫“经学”？

对这两个问题，我们依次作答如下：

先谈第一个问题。先秦诸子的其他学派和儒家一样，也有自己的经典，而且它们被命名为“经”的时代还比儒家的“经”为早。譬如墨家学派《墨子》书中的《经上》、《经下》，就叫着《墨经》^①，法家学派李悝的著作，就叫着《法经》^②，道家学派《老子》一书被称为《道德经》，该学派还另有

《黄帝四经》。《墨经》得名最早^③，其次要算《道经》^④，儒家典籍之被有“经”名和确指其最初规定的具体内容为“六经”，为时还要晚些^⑤。值得注意的还有：其他学派的“经”，都是某个学派的创始人（如法家的李悝，道家的《老子》作者）或其门弟子（如《墨经》的作者）的著作；而儒家学派的“经”，则不是这样，仅仅是其学派创始人孔子，为教授生徒开设的课程中所使用的教材^⑥。

再谈第二个问题。先秦诸子各个学派的“经”，都同样地有注释和传说的，儒家之外，如墨家的《墨经》就有《经说上》、《经说下》、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；道家的《老子道德经》，法家著作《韩非子》为之作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，此外还另有《邻氏经传》、《傅氏经说》、《徐氏经说》^⑦等。可是这些“经”的“传”、“说”、“解”、“喻”，都没有纳入后世所修“经学”的范围。当然后世也有少数的经学专家，在解经的总名义下来谈到诸子书中的音、义、衍、脱、假、误的书籍的^⑧，也只把诸子书作为经的附庸，不能分庭抗礼；就在解诂的过程中，亦只是随文起解，并不讲求什么师法、家法^⑨一类的清规戒律了。总的说来，“经学”之名，只为儒家一个学派所专有，

其他学派不得分享。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

追溯其源，它是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、表彰儒术政策所造成的结果。西汉初年，遵循秦制，设博士员数十人，以备皇帝的咨询。儒家与诸子百家一样，皆立学官，为置博士。自武帝即位，先后采纳董仲舒、公孙弘的建议，罢黜诸子百家的博士，专立五经博士，世守其学，并为之置博士弟子，作为士人进入仕途的初阶。这样，就使儒家的经典成为法定的经典，服膺儒术的博士弟子均可进入仕途，即后人所谓的“定儒术于一尊”了。“经学”之名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^⑩。汉武帝实行这个政策，并不是偶然的，因为儒家经典宣扬的“德治”或“礼治”，符合了封建统治阶级在取得政权后要求稳定政权的需要，使他不能不作出这一“明智”的决策。而后代的帝王之所以遵行而不改，亦莫不是从其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。从而使“经学”在中国封建社会，有它一段漫长的发展史。

或又问：如上所说，“经学”之名为儒家所专有，已能使人明白了。现在愿闻“经学”的具体内容和它的发展情况。

兹就这两个问题，分别予以回答如下。关于经

学的具体内容，只谈两点：

一、儒家经典的数目。儒家的经典，最早只有六部，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当时只叫着“六艺”，后来被尊为“六经”。经过秦始皇焚书之后，《乐经》亡失，仅剩下五经。或说：《乐》本无经，不过是《诗》的乐章，汉人举“五经”已包括了“六经”。在汉时，还有“七经”之称，即在原有“六经”之外，加上一部据称为孔子、曾子所作，实际上是孔子再传以后的儒者所作的、提倡孝行的书——《孝经》。唐代初年，开科取士，在明经科中，规定试经的范围，又有所谓“九经”。其实“九经”不过是“五经”的扩大，除原有的经外，将几种解经的传（有的是单行本，有的是依附于经的合写本）也称为经。如将礼经两种（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）和礼传一种（《礼记》）称为“三礼”，再将先后列为官学的《春秋》传三种（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左传》）称为“三传”，再加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，就合称为“九经”。唐文宗开成年间，刻立石经，于“九经”外，加刻孔子的言行录——《论语》和据称为孔子、曾子所作的《孝经》以及先秦训诂名物的书——《尔雅》，就成了“十二

经”。到了北宋时，又把儒家另一代表人物孟子的著作——《孟子》一书也列入经部，于是就有“十三经”之名。目前我们看到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所称的“十三经”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儒家的经典从“六经”发展到“十三经”，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儒家经典需要的数量愈来愈大，不仅把孔子教授生徒开设课程所使用的教材叫“经”，连孔子及其门弟子的言论、著作，乃至可以解释儒家经典的书，都一道被推许为“经”了。

二、经学中的今、古文之分。这个问题是由秦始皇焚书所引起的。西汉初年，废除挟书的禁令，儒家的经典一时已无旧本可循，只凭一些年老的经生，口授先师传习的经典，用当时通行的文字（隶书）记录下来，所整理成的定本，就叫“今文经”。这些“今文经”，有的一经由一人传授，只有一家、一个本子；有的一经由几个人同时传授，就有几家、几个本子。武帝建元年间立五经博士，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（公羊）四经，均各止一家^①，而《诗》则有齐、鲁、韩三家^②。武帝以后，各经都分成几家，各家都谋得一个博士。于是传授五经的博士就立了十四个^③。在“今文经”中，也有长期受压、未立博士的，如足与《公羊春秋》相抗衡的《穀

梁春秋》，由于当权者的偏好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没有争到一席博士的地位^⑨。

可是秦火并未把所有的儒书都焚掉，在民间，特别是在齐鲁燕赵地区，就有人把儒书藏在墙壁里，窖在泥土里，若干年后，被人发掘出来，这些儒书是用战国时六国文字写成的，就叫“古文经”。景帝的两个儿子——河间献王、鲁恭王，都各得一批藏书。献王好儒，民间多献其先祖旧书，其中有古文经传。恭王好治宫室，坏孔子宅，从其墙壁中发得的遗书，都是古文经传。先后出世的“古文经”，著名的有《左氏春秋》、《毛诗》、《逸礼》（原有的《礼》又名《仪礼》，此为《仪礼》十七篇外的古文《礼经》）、《古文尚书》（《书》亦名《尚书》）、和《周礼》（原名《周官》）。可惜这些“古文经”来晚了一步，已立为学官的“今文经”博士，为了巩固其垄断的地位，对它们故意刁难，说什么“尚书为备”（即是说：《今文尚书》二十九篇是完备的本子）、“左氏为不传春秋”（即是说：《左氏春秋》不是解《春秋》的传）一类的诽谤，使他们不得立为博士。这样，就挑起了“今”、“古”文之争。刘歆是一个典校皇家图书馆藏书的专家，颇为“古文经”抱不平，曾写信去责备那些博士和主管博士机关的太

常，遭到了他们的反对。后来他倚仗王莽的政治权势，在平帝时，才将上述前四部“古文经”立为博士，又于王莽的新王朝中，复立《周礼》博士。不料王莽的新朝没有多久就垮台了，这股政治旋风固然对“古文经”的兴起给予了一些方便，也为它们的前途带来了一些灾难。

关于经学的发展情况，清代的学者把它概括为“不过汉学、宋学两学互为胜负”^⑮。这一说法有它的高明处，即简略易知。它把凡属从经书中去寻找微言大义的，或替经书中的名物、制度作注的，都叫做“汉学”；凡属以性、理之学^⑯来解经的，都叫做“宋学”。换句话说，“汉学”是以儒家经典作为说经者的研究对象；而“宋学”则不过以儒家经典作为印证说经者自己见解的资料。因此，“汉”、“宋”两学，不是以其所属的时代命名，而是以其所具的特点命名。据此，两汉的经学固然是“汉学”，清代的乾嘉学派（包括吴皖两派）^⑰，常州学派^⑱，也都是“汉学”；而“宋学”则包括宋明理学和清代的性理之学。但是这一说法的缺点也很多：（1）不完备。“汉”、“宋”两学不能概括整个经学的内容。譬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经学，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玄学^⑲化了的经学，以王弼的《周

易注》和何晏的《论语》注（即其所著《集解》中的“自下己意”）为其代表作，它们都不属于“汉学”的范围；又如南宋时代陈亮、叶适的事功派^②及其沿袭到清代的浙东学派^③，亦不能划入“宋学”的范围。（2）不细密。“汉学”中的今、古文学派，水火不相容，与其求同，不如别异；“宋学”中的程、朱理学^④与陆、王心学^⑤，针锋相对，求其同处亦不多。因此，称“汉学”不如直说为两汉经学，称“宋学”不如直说为宋明理学，把它们从特点命名回到以时代命名。（3）不明由“汉”至“宋”之故。因为“宋学”的产生，还受了经学以外学术思想的影响，如道教、佛学就曾对它有很大的影响。

经学发展的情况，可以概述如下：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，首先，是以“通经致用”的今文经学，在西汉处于支配的地位，董仲舒是这个时期今文家的代表人物。其次，是主训诂名物，讲求古制的古文经学，它要通过和今文经学的几次搏斗^⑥，到东汉后期才成为显学，马融是遍注古经的权威，而郑玄则是以古学为主和能取今学之长而攻今学之短的大师。再次，是在魏、晋、南北朝时期，出世思想的老庄之学盛行，经学向它妥协，就出现了“各教中自有乐地”的玄学化的经学，王弼、何晏倡之。这一

派经学在南朝处于统治地位，与北朝抱守残缺的古文经学相对峙。又次，是在隋唐时期，古文经学与玄学化的经学并存，但在当时，无论从学术上的声望、或政治上的地位来说，它们都远不如主清静寂灭的佛教和专致长生久视之术的道教。又次，是在宋、元明时期，经过残唐五代长期纷乱的结果，维护道统^②、提倡伦常^③的新儒学（亦泛称“道学”或“理学”）抬头，并从道教和佛学中吸取养料，分别成立了程、朱理学与陆、王心学。程、朱理学主张天理常在，一切伦常都是永久不变的天理，学者要“即物穷理”，按天理行事。陆王心学主张宇宙在人心，明心就可见人性、天理，体认天理就是致人心的“良知”。程朱理学，自南宋以来，一直居于优势地位；至明中叶，王守仁出，心学始有取而代之之势。又次，是在清朝，由于满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推行高压政策，儒生逃避现实，都走进故纸堆中，时常打交道的是儒家经典，于是又有新“汉学”的诞生。新“汉学”的开端是乾嘉学派，惠栋、戴震分领其伦，以训诂、考证擅长，其所创获往往超过东汉的古文经学。可是清王朝逐渐走向下坡路，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动摇，以庄存与为首的常州学派应运而兴。他们主张通经致用，发挥西汉今文经学的

特长；又怀疑古经，重新引起今、古文的斗争。最后，是到了鸦片战争之后，清王朝面临崩溃的局势，中国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社会，中华民族处于空前严重的危机。值此之际，新今文家出了一个康有为，打起“托古改制”的旗帜，主张变法维新，发展资本主义，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和延续清王朝的寿命，也算通经致用发展到了顶点。可是他的活动失败了。新古文家出了一个章炳麟，其学术思想已超越旧古文经谨守训诂、考证的范围，提出“复九世之仇”的口号，主张排满革命，推翻清政府，建立民国，发扬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。他参加的辛亥革命虽然赶走了一个皇帝，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。更为突出的，还是在近代经学中出了一个廖平；他受今文经学的濡染很深，又有很好的古文经学的根底，是一个兼通今、古两学的学者；他的政治主张，既不赞成革命，也未支持维新，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；他的经学思想，先后经历过六次变化，愈变愈奇，最后变到虚妄怪诞。他的经学六变，标志着中国旧时代经学的发展已经到了山穷水尽、走投无路的地步了。

如上所述，经学降及近代，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，我们现在还有研究它的必要吗？

须知，我们现在研究经学，在对待经学的态度上，是和前人有所不同的。前人研究经学，是要讲求圣人之道；我们现在研究经学，只不过把它作为历史文献来整理而已。

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不妨再温一下经学的历史。先言今文经学。今文经学崇拜孔子，尊孔子为“受命”的“素王”^②，以六经为孔子所作，所以六经中都寓有孔子的微言大义，尤以《春秋公羊传》最为显著。到了新今文经学，更以孔子作六经为“托古改制”，凡六经中所载古先圣王的嘉言懿行，莫不是孔子的立说垂教。儒生通经，皆可致用，即有所谓“以《禹贡》治河^③，以《洪范》察变^④，以《春秋》决狱^⑤，以三百五篇当谏书^⑥”。今文经学如此宣扬孔子与孔子之道，不正是讲求圣人之道吗？

次究古文经学。古文经学崇尚周公，以六艺（除《春秋》外）之作，多与周公有关，尤以《周礼》为周公“致太平”^⑦之书；而孔子则为先师，善述古经以传后世。清末古文家至说“六经皆史”^⑧，亦以《周礼》为详记西周建官设制之书，古制灿然可循；而孔子的良史之才亦为不可多得。古文家的尊孔虽不如今文家，其以六经为述古圣先贤之立言行事，则是既定不移的。

再说玄学化的经学。这些玄学化了的经学家主张“名教中自有乐地”，就是认为“名教”不可废，而且孔子的“名教”是足与老庄的“自然”相对峙的。“名教”是一切伦常、礼教的简称。因而推崇“名教”，也就是推崇儒家的圣人之道。

后讲宋明理学。宋明理学的程、朱理学，以继“道统”为己任，存“天理”为己事。他们所谓的“道统”，就是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道；所谓“天理”的主要内容，就是儒家的纲常名教。他们为了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以至主张宁肯饿死，不能失节，后世讥之为“以理杀人”^④，这些理学家恪守圣人之道之顽固态度，是够惊人的。心学中的陆九渊主“明心见性”，所见的“性”，就是人性，人性皆善，具有仁、义、礼、智的德行。王守仁主“致良知”，所致的“良知”，能够辨别善恶，而善的标准也就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。他们亦是阐说孔门的心传之道。

我们在上面把历史上各个时期经学宗派的旨趣都讲到了，认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即都是讲的圣人之道。这些宗派在不同时期的兴起，说明这个圣人之道，能以不同的形式来适应不同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，它们或被用来代替惨酷[he核，苛刻之